

2004

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

2004 Strategic Report: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

X22

Z584



中国可持续发展 战略报告

2004 Strategic Report: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报告的主题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核心、战略要点、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对科学发展观的阐释以及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突破,即发展战略的理论突破、发展战略的形态突破和发展战略的体制突破,做了重点的论述。特别是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如何在未来20年进程中对于国家精准调控的机理,做了详细的分析。由此,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13项总体目标和分步实施计划,设计了有关的指标体系,拟订了新时期干部政绩考核的5项标准,包括了未来20年中国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四大方面的建设方略研究。本报告还以以往的年度报告为基础,对于可持续发展的统计分析和可持续能力的比较分析,进行了全面的更新。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领域中,本报告独立地提出了系统辨识“发展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资产负债表”,连续4年完成了全国的定量运算框架,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政策建议。

本报告对于各级决策部门、行政管理部門、立法执法部門,以及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社会公众,具有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中国科学院科学与社会系列报告)

ISBN 7-03-012902-4

I. 2… II. 中… III.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04 IV. X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9166 号

责任编辑:李敏/责任校对:包志虹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张放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4年3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35 1/4 插页:2

印数:1—15 000 字数:710 000

定价:7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组 长 牛文元
副组长 刘 毅 李喜先
成 员 王 毅 胡 非 蔡 晨
杨多贵 陈劭锋 陈 锐

报告总策划 曹效业
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2004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执笔组

报告执笔者 牛文元 杨多贵 陈劭锋 陈 锐
康大臣 王海燕 毛志峰 袁宝印
柳一路 曲奔驰 李嘉菲 贺铁林
朱良平 薄初节 高络华 蔡灵地
钱达明 岳天祥 王 徽 李喜先
解 源 黄和宁 高 菁 郑爱丽
肖梅嫦 刘雅苹 秦明周

本报告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中心赞助，特此致谢

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实质 深入探讨和谐发展规律

(代序)

路甬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中国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首先必须深入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才能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一、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工业化以来，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正

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①

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失衡，再到新的和谐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马克思说过：“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②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同时，人类在自然的“报复”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和谐与否，如何实现和谐，取决于人类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当时，人类以采集狩猎为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由于天然食物供给的有限性和不均衡性，人类为了生存，聚居在自然条件优越、天然食物丰富的区域，形成了利用原始技术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仅能维持个体延续和繁衍的低水平物质消费方式，以及以家庭与部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时期，人口数量与平均寿命都很低，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人与自然处于原始和谐状态。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在整体保持和谐的同时出现了阶段性和区域性不和谐。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的提高，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形成了基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以及以大家庭和村落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局部性和阶段性紧张。但从总体上看，由于这个时期，人类开发利用

自然的能力仍旧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仍能基本保持相对和谐。

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紧张状态。工业社会创造了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占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大大提高。人类活动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创造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极大地降低了人口死亡率，延长了人的寿命，促使世界人口急剧膨胀。工业社会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类已不再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不断追求更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享受。但是，工业社会的发展曾严重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造成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自然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

近 50 年来，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多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困难；二是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前需要而忽视后代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三是通过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全球扩散。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现实，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

综观整个社会发展史，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不合理使用，都导致了自然界做出报复性的反应。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③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之一。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和严峻，但是人类绝不可能退回到被动适应自然的道路上去，只有依靠发展，才能实现新形势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资源的合理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如果人类不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长此下去，地球也有可能成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三、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 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

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与发展。在古代，人们凭借着简单的知识，产生了一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我国先秦时期《周易》中有“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④的提法；老子也曾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⑤西方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同时也形成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论自然观。工业社会初期，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日趋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迫使人们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运而生。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认识，深刻揭示了工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等理念提出了挑战。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用触目惊心的案例、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大量使用杀虫剂对人与环境产生的危害，敲响了工业社会环境危机的警钟。1972 年，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尽管该报告中的观点有些片面和悲观，但是其中提出的“自然界的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观点，依然警示了人们。1972 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系统阐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和国际公约的问世，标志着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02 个国家首脑参加了会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共同签署了五个重要文件，讨论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有 153 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正式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了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应是人类共同的行动纲领。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可持续发展执行计划》和《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确定“发展”仍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并进一步提出了经济、社会、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以及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五大优先领域。

20世纪后期,国际科技界组织实施了许多大型科技计划,各国政府纷纷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相应的行动计划,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逐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以《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等为代表的全球性科技计划,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加强控制污染排放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以期建立资源高效利用与环境友好型社会。例如,1996年,德国实施了《物质闭路循环与废物管理法》,2000年,日本实施了《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法》;又如,欧洲联盟各国大力调整能源结构,计划至2010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目前的约6%提高到12%,风力发电占总发电量的22%;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努力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提高资源的循环利用率。我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编制了《中国21世纪议程》,积极参与有关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随着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我们必将越来越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与理解,越来越自觉而及时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使中国真正成为发达的世界强国。这无疑将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2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④ 易传·泰·象传

⑤ 道德经·第25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创新

(导言)

牛文元

一、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发展红利”的挖掘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要点，是中央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的深化和创新，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化到工作任务之中。

“五个统筹”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为内容，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推进为目标，以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为途径，包括了当前改革和发展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构想。

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平台，必须注入全新的动力源。十分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红利”的支撑，从农村改革、对外开放、生产关系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一直到全面的制度创新，给经济的快速成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种动力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仍然是带根本性的依托。

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已经具备了从“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d)中索取的成熟条件。所谓“发展红利”，是指区域经济规模扩大与生产力要素重新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发展红利的获得，必须通过提升区域规

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区域优化、规模扩大、结构重组的跨越式发展。

研究表明，发展红利将在两大方向上呈现出非线性增长的趋势：

发展红利获得的第一方向是“水平尺度”的放大，即地理区域范围在线性扩大的同时，它所创造的“发展红利”呈现出非线性增长。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的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 10 倍；但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 100 倍。以上规律告诉我们，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其最高理想就是为了获取世界级的最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红利获得的第二个方向是“垂直方向”的调适，即实施全方位的结构调整，不仅要着眼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应关注更高级的具有台阶式结构提升的区域空间调整、社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调整，从而获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红利”。

发展红利的大小反映了以下七类区域优化的综合结果：①区域整合的规模与程度；②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程度；③产业链布局的合理程度；④发展成本的降低程度；⑤大中小城市功能的协调程度；⑥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程度；⑦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

正如欧洲联盟已经通过国际经济一体化获取发展红利一样，如今中国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红利这一条件已经成熟。而组团式城市群正是获取这一发展红利的有效形式或载体。组团式城市群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中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最终归宿。城市化的数量和质量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城市体系或组团的形成，是汲取发展红利的最有效途径。

为支撑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体进程，经过全力扶持与重点培育，未来 20 年中，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红利”效应的成功溢出，使得他们的产出对于国家 GDP 的整体贡献率由现在的 35% ~ 38% 上升到 65% ~ 70%，可大大减轻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压力，与世界经济大国著

名大城市群(区)的产出水平大致相当。对比而言,中国三大城市群建成(发展红利充分溢出)的五大标志将体现为:①人口密度从现在的750人/公里²增至2000人/公里²(香港地区5500人/公里²);②经济密度从现在的3000万元递增到1.2亿元/公里²(香港地区1.8亿元/公里²);③资本密度达到现有投资额的4倍以上;④消费密度达到现有社会零售总额的5倍;⑤各类网络密度将实现快速交通、管道设施和通信光纤能力等5~10倍的跃增。

为了动态评估和实时调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释放能力,即定量评价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发展强度和发展质量”,根据各组团式城市群的区域特点、发展历史、基础实力、发展动力、外部牵引和内部动力等要素,《2004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已经设计出由五大支持系统组成的评价体系,既能对区域整体发展,也能对区域内部差异做出科学地、合理地、规范地比较。

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发展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国家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必然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以寻求资源空间优化和系统运行流畅的“整合交集”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让发展红利得到充分涌流。

二、发展战略的形态创新——从点状拉动到组团式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经济发展的整体形态呈现出以点状拉动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导特征。以4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开发区为代表,努力发挥点状拉动的带动作用,在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改革试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窗口、辐射和示范的作用,成为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力军,对推动国家经济整体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世界银行认为:国家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是一个标志性台阶,意

味着财富积累能力将步入一个新的航道。与国际已有的经历相对照：美国的 GDP 总量在达到 1.01 万亿美元以后，第一个 10 年的 GDP 总量达到 2.708 万亿美元；日本的 GDP 总量在达到了 1.048 万亿美元以后，第一个 10 年的 GDP 总量达到 2.4251 万亿美元；中国的 GDP 总量在 2000 年达到了 1 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依照国家计划在其后的 10 年（即 2010 年）预计将翻一番，达到 2 万亿美元。

为什么美国在达到 1 万亿美元台阶后，用了 10 年的时间使得 GDP 增长了 1.7 万亿美元，日本增长了 1.4 万亿美元，中国分别比它 +63 们少增长 0.7 万亿和 0.4 万亿美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注意到美国当时的城市化率达到 87%，日本的城市化率超过 64%，而中国在 2000 年的城市化率仅为 36% 时，也许可以更深一层地认识到城市化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社会财富集聚能力的差异。因此，在 21 世纪的头 20 年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的组团式城市群建设步伐是发挥城市中心作用、提高经济效率、降低发展成本、挖掘发展红利的必由之路，也是消除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公平的必由之路。2001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这种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进一步撰文指出：“城市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21 世纪是城市的世纪，还将由以下的统计数字表明：20 世纪下半叶美国 GDP 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达到 67%；而日本 GDP 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 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 GDP 目前约占全国的 10%、长江三角洲的 GDP 约占全国的 18%、京津环渤海地区的 GDP 约占全国的 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经济的整体贡献率仅达 35%。美国、日本、中国的对比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制高点和主力军尚未形成，发展红利的巨大潜力远未释放，组团式发展的强力拉动有待开掘，空间整合的优化能力亟须提升。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日本三大城市群

的集聚能力和 GDP 贡献率达到整个国家的 2/3 以上, 而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全国 GDP 的贡献率只有 1/3 强的原因。

纵观中国城市化 50 年演替的历史轨迹, 未来 20 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方向、重点、格局、成效, 将对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战略性的作用。中国经济将从原先的“点状拉动”越来越向各个大城市群的“区域组合”(组团式拉动), 特别是向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环渤海湾这三个大城市群进行集聚。可以预期, 三大城市群将在不久的将来健康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空间。

纵观全球城市化演进历程, 城市模式的进化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主要阶段: ①点状表征的〇维城市化模式, 强调传统城市中心的集聚性; ②线状表征的一维城市化模式, 强调城市带的通达性; ③面状表征的二维城市化模式, 强调城市群的结构性; ④体状表征的三维城市化模式, 强调组团式城市群的网络性。城市发展模式向组团式城市群的战略突破, 在水平尺度上追求地理区域的放大、生产力要素重整、产业链布局优化, 在垂直尺度上追求完善系统等级、突出功能互补、提高运行效率、减低发展成本, 从而避免城市摊大饼式地单极化扩张, 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镶嵌体系, 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战略联盟, 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 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逻辑充填, 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时空耦合,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现代城市体系。

佩鲁理论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 具有积极的作用, 对于所在区域中资本、人力、技术、资源和市场的有效集聚, 有着重要的价值, 作为增长极对于周边的辐射带动也是十分必要的。但随着城市进程的高级发展, 以增长极为代表的城市扩张, 必然带来相应的城市病, 同时为区域内、区域间的恶性竞争提供了明显的壁垒。这主要体现为, 单极化城市发展的结果, 可能引向各自的小而全“桶板建造”, 阻碍了生产发展向高级形态的跃迁, 由此: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城市规划短视与失灵。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产业布局的选择性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经济升级成本加大的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地方保护主义的恶性竞争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区域发展红利的丢失危机。

城市单一增长极必然带来区域共建与战略联盟建立的危机。

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同时，要保持东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快建设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壮大国家实力；加速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效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发展，进而推进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积累新经验，发挥示范作用。着眼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着眼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综合服务功能；积极探索三大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协同发展的新路子。着眼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合理地利用外资，继续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着眼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建设和管理创新；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切实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着眼于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并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促进中国腹地加快发展，彰显东部的示范作用和对西部、东北部的支援作用，实现“西部提速，东北攻坚，东部保持，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

世界经验证明，实施组团式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是有效克服传统式城市产生城市病的基本途径：

第一，组团式城市群从结构上去认识，是单一城市本身的“全息放大”，即原先单一城市中的道路拥挤、环境恶化等，是由于空间密度被过分占用和容量超出临界承载能力所引发的，如果将其空间做出等量放大和有效扩张承载力，则传统发展所引发的城市病就会得以从根本上发生好转，因此组团式城市群可以理解为对原先单极城市的有效减压。

第二，如果城市空间被放大了，虽然密度容量的限制被解除了，但可

能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距离加大、线路加长，即会出现速度的限制，必须用相应的快速通道和相应的网络系统，连接城市群之间的各种交流，将组团式城市群之间的大、中、小城市作为节点，将城市之间的区域作为基底，形成一种主体式的网络系统，加快流通的速度，对于以下五大流动：①物质流：各类产品、资源、水等的流通；②能量流：有关的电能、管道运输的天然气等的流通；③信息流：以因特网为支撑的各类信息与数据的交流；④人才流：各类人才资源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重组和交流；⑤货币流：以金融和资本的流动作为标志。这五大流动的全面提速，弥补了由于城市群内部距离加大和线路加长所带来的不利。

第三，组团式城市群的建成，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由于原来单极城市中人口密度过高，人均绿地偏少、有序居住程度较差的不利条件，在产业结构和生活质量上都处于不利的状况。

三、发展战略的体制创新——欧盟组织架构的借鉴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2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艰难探索，在探索中勇于实践，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突破，走出一条富民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新任务。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做出了全面规划和具体工作部署，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证，把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了新的台阶，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踏上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征程。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跨越，一个新的伟大实践，也是一项更加艰巨、更加宏伟的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

日臻完善，建立在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行政区为单元的行政区经济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其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是地方保护主义。为了追求地方政府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地方经常对经济进行不合理的干预，行政区成了阻隔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一堵“看不见的墙”，行政边界构成了阻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壁垒。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一个行政区的“经济”，往往以另一个区域甚至国家的“不经济”为代价。由此，引发不同行政区经济上的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低，浪费十分严重。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利益摩擦因之激化，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和保护自身利益，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贸易壁垒，实行市场封锁，阻碍经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在现行行政区划条件下，行政边界的“硬”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却阻碍了城市“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城市进程的步伐。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是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二是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同时善于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有益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行途径，建立起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和生机。三是必须着力解决深层次体制矛盾，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注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牢牢把握改革的进程。四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力度、开放节奏、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在全社会形成推动改革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动力，实现稳中求进。当前，我国的改革正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仍然存在，生产力发展仍面临着诸多体制性障碍。这一切，要求我们借鉴以往的历史经验，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